

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

唐诗与道教

黄世中/著



漓江出版社

丛书主编·梁超然

唐诗与庄园文化

林继中 / 著

唐诗与音乐

朱易安 / 著

唐诗与绘画

陶文鹏 / 著

唐诗与舞蹈

张明非 / 著

唐诗与科举

陈飞 / 著

唐诗与佛教

毛水清 / 著

唐诗与道教

黄世中 / 著

唐诗与儒家

梁超然 / 著

从书封面设计

石绍康

从书策划

聂震宁 朱寿兴

ISBN 7-5407-1704-1



9 787540 717049 >

ISBN 7-5407-1704-1/G · 498

定价：6.50 元

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

唐诗与道教

黄世中 / 著

漓江出版社

唐诗与道教

黄世中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37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407—1704—1/G·498

定价：6.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①。研究唐代诗歌史，也应作如是观：如果懂得道教，唐诗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唐代是道教的全盛时期，同唐诗水乳交融，一方面是诗歌受道教的影响，诗中多有道蕴；另一方面，诗人以诗“演道”言志，表达自己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见解。有许多道士、女冠本身就是诗人，有许多诗人后来又都皈依道教，一些诗人对道教的崇尚简直到了迷狂的状态：

山水诗洋溢着道意；
恋情诗蕴蓄着道韵；
醉酒诗散发着道味……

但是，唐代诗人中纯正的高道却寥寥无几，他们在尘世中：
或营营驰逐，希图走“终南捷径”；
或道其外而儒其里，先道后儒；
或愤世嫉俗，佯狂醉酒，借酒避祸；
或冷眼观世，心中忧患，保持一种独醒心态；

^① 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女道士因爱的困扰，恋情变态，可怜可哀；

帝王们疯狂崇道，金丹丧命，可悲可叹……

道士、道姑、诗人、剑侠，帝后、公主，儒生、僧人，总之是“三教九流”，谁都想长生不死，至今却一个不存！都说“八仙”寿命最长，道法无边，其实“八仙”中有四位便是唐代诗人。

本书论述了道士、女冠及崇道诗人，探讨他们的诗心、诗意、诗境；论述了山水诗、恋情诗和醉酒诗，揭示诗中的道意、道韵、道味。前四章以道士和女冠诗人为主，五至八章则以世俗中的崇道诗人为主。最后就道教对唐诗审美影响，论述了唐人道蕴诗的审美情趣。

目 录

前 言	(3)
一 从“终南捷径”说到外道内儒	(1)
(一)“此中大有嘉处”	(2)
(二)先儒后道和外道内儒	(5)
二 营营驰逐后对长生不死的追求	(15)
(一)从韩湘子说到营营驰逐	(15)
(二)“金丹一粒定长生”	(19)
(三)天仙、地仙和尸解仙	(24)
三 歌吟醉酒、佯狂玩世和独醒心态	(31)
(一)蓝采和的醉歌和陈陶的提篮采禾	(31)
(二)歌吟醉酒和佯狂玩世	(34)
(三)愤世嫉俗和“独醒”心态	(40)
四 爱的困扰与女冠的变态恋情	(45)
(一)唐代女冠及其爱的困扰	(45)
(二)唐代女冠的“半娼式”恋情	(53)
五 唐代诗人的崇道迷狂	(64)
(一)福、禄、寿和崇道的迷狂心态	(64)
(二)上行下效,举国癫狂	(70)
(三)唐代崇道诗人“点鬼录”	(76)

	(四)过从酬赠及道事、道观的咏歌	(82)
六	唐人山水诗的道意	(93)
	(一)游仙诗、步虚词和唐人山水诗	(94)
	(二)清静幽旷 随缘任运	(99)
	(三)狂狷傲世与仙风道骨	(105)
七	唐人恋情诗的道韵	(111)
	(一)“葛洪还有妇，王母亦有夫”	(111)
	(二)仙事道象的摄入及其意化和情化	(115)
	(三)招魂、游仙和梦幻寄情	(121)
八	唐人醉酒诗的道味	(130)
	(一)从“诗人通趣”说到对现实法则的反抗	(130)
	(二)任心自适和复归自然的追求	(138)
	(三)忧生念死和畏祸托醉、得全于酒	(143)
九	道教与唐诗审美	(150)
	(一)唐人道蕴诗的惆怅美	(151)
	(二)唐人道蕴诗的傲岸美	(156)
	(三)唐人道蕴诗的静穆美	(160)
	(四)唐人道蕴诗的感伤美	(165)

一 从“终南捷径”说到外道内儒

唐代道士之多，居历朝之冠。但能诗的道士却不多，远不如释教诗人。《全唐诗》中有诗僧一百一十二人，诗二千九百三十八首。而道士诗人（不含女冠）仅三十六家，存诗才五百七十四首，为僧诗的五分之一^①。其中吕洞宾存诗最多，达二百八十六首；吴筠次之，一百二十八首；杜光庭三十首；郑遨十七首；四人诗合计四百六十一首，占全唐道士诗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余三十一家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三首，人均才三首多。但仅从这五百多首诗中，已经足以表明道士诗人与世俗诗人的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令我们感兴趣的，也许是他们那道貌面纱掩盖下的勃勃俗心——那永远无法遏止的、有似于一般人的世俗之心。同世人一样，他们无法忘怀功名利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曾“弱冠涉儒墨”（吴筠《酬刘侍御过草堂》），希图从科举进身仕途。但是，大多数人的美梦都在现实中被打得粉碎，因而从“有意当世”转而看破红尘，从儒家的经世致用转而为道家的信徒，皈依道教，成了道士。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思想与存

^① 此据《全唐诗》卷八百六至八百六十二统计。其中卷八百六至八百五十一为僧诗，卷八百五十二至八百六十二为道、仙诗。至如李白、顾况、施肩吾等先为僧者后受道箓者，不计在内。

在之间的对立或矛盾。”^① 我们从唐代的道士诗中看到了这种对立和矛盾，看到了道貌现象掩盖下的勃动的俗心：外道内儒。

(一)“此中大有嘉处”

成语“终南捷径”，几乎是家喻户晓，说的是初唐诗人卢藏用的事。据《新唐书》本传记载：

(藏用)始隐(终南)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慚。

司马承祯挖苦卢藏用隐居终南山学道是假，而借隐居以沽名入仕才是他的真正用心，无疑是揭了这位“卢隐士”的痛处，所以他听了感到羞惭。原来，终南山在长安西南，距京师极近，隐居容易张扬名声，为时君所征召。果然，武则天以卢藏用为淡泊名利，为制止奔竞之风，于长安年间(701—704)征拜他为左拾遗，掌供奉讽谕、扈从及荐举之职。卢藏用不愧为“随驾隐士”，登朝之后，“赵超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旧唐书》本传)。《全唐诗》卷九十三录存藏用诗八首，就有五首是奉和应制及谄事安乐公主之作，极尽媚悦诡佞之能事。安乐公主是唐中宗的小女儿，史载公主府第官属“皆出屠贩，纳訾售官”，甚至“旁撤民庐”、“掠民子女为奴婢”(《新唐书·诸帝公主传》)，无恶不作。卢藏用就是靠谄事贵主，所以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便从左拾遗爬到了吏部侍郎的宝座。唐制，左拾遗仅为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下卷，第436页。

七品上，而吏部副长官则已是正四品上阶，专掌朝廷选授官职、勋封及考课等职，权力极大。

信矣乎！终南之为捷径也。难怪《新唐书·隐逸传序》说：

放利之徒，假隐士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按嵩峰少室山）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

卢藏用就是这种“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旧唐书·隐逸传序》）的假道者。

除了卢藏用爬上高官外，因修道而名动朝廷，获征召除官，或受优渥恩遇者，在道士诗人中如司马承祯、叶法善、张果、吴筠、杜光庭、张氲、彭晓、韦渠牟、李遐周、柳泌、程紫霄、白元鉴等等都是。其中像张果，“明皇以礼致之，肩舆入宫，擢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全唐诗》卷八百六十）。道士柳泌“少习医术，言多诞妄”，“自云能致药为不死者”，宪宗即拜为台州刺史，赐金紫（见新、旧《唐书·皇甫镈传附》）。道士彭晓在孟蜀朝授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居然还俗当了尚书省的属官。德宗时有一个宠臣韦渠牟，先为道士，转而为僧，后来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干谒浙西观察使韩滉，重新戴起了儒冠，历官四门博士、右补阙、太常卿、刑部尚书。韦渠牟的以道入、以儒为归宿，最能说明唐代一部分士大夫正是以归禅入道作为他们谋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新唐书》本传说他“为人佻躁，志向浮浅，不根于道德仁义，特用险巧中帝意”。可是，正是这样一个“佞道士”，居然官运亨通，“权倾相府”、“权侔人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韦渠牟把自己修道时的茅山道友崔芻、郑随也征召入都，授以官职。可见其早年为僧为道，实质上都是一种“险巧”心计，一旦时机到来，他便要走出“终南捷径”，去步卢藏用的后尘。

这条“终南捷径”，从初唐到晚唐五代，一直是许多道士、隐者的攀缘之路。晚唐诗人喻凫《赠张演处士》诗就说：

道高天子闻，名重四方招。

所以，对于唐代多数道士来说，隐居、入道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天

子闻”和“四方招”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道士都如卢藏用、韦渠牟那样幸运，在终南、嵩少或各个名山修道隐居，也并非都是“捷径”。有的人终其一生，无人荐举，至死也未能使“天子闻”、“四方招”。李咸用《悼范摅处士》就感叹范摅“虽有公卿闻姓字，惜无知己脱风尘”。有的人到处干谒，到头来仍只能与烟霞为伴。钱塘有一位姓唐的隐士，先是隐居学道，后来不甘寂寞，又戴了纱帽到处干谒，结果呢？请看方干的《赠唐处士》诗云：

常共酒杯为伴侣，复闻纱帽见公卿。

莫言举世无知己，自有烟霞识此情。

也有的不善伪装，沉不住气，结果连脑袋都丢了。唐末有一个自称叫黄山隐的道士，以道服谒皇甫大夫。皇甫素好道术，不敢怠慢，遂起近之。黄山隐傲然不窥，向竹而吟曰：

积尘为太山，掬水成东海。

富贵有时乖，希夷无日改。

锋节出崆峒，霓衣发光彩。

古者有七贤，六个今何在？

黄山隐以“竹林七贤”之一自居，则至少也已五六百岁。皇甫未能明其真伪，就留黄于宫观，心想：此人若是至道，则名利俱捐。于是令军将持书并送绢百匹、钱一千文前往试探。黄山隐拆信，欣喜异常，立修书回报，并脱去道服，饰以青衿，引见谢陈，礼度甚为恭谨，同初来时的傲睨之态判若两人。皇甫大夫判其死刑，并作诗一首以讽云：

道士黄山隐，轻人复重才。

太山将比甑，东海只容杯。

绿绶藏云帔，乌巾换鹿胎。

黄泉六个鬼，今夜待君来。

看来，终南并非都是捷径，士大夫之弃儒归道，不仅别有企图，实也

不得已而为之。唐代道观遍天下，道士不计其数。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载：唐自开国至中和四年（884），全国“所造宫观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让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单是《全唐诗》中涉及的著名道观即有一百七八十处，除终南、嵩山、茅山等著名道观外，如长安的玄都观、开元观、华阳观，华山云台观，剑阁自然观，成都严真观，青城山丈人观，九疑山无为观，醴陵玉仙观，庐山青溪观，余杭天柱观，武康碧落观，嵊县金庭观，天台桐柏观，廷平天庆观等等，而道士、炼师则多如牛毛。这些名山大观，又有几个道士能像卢藏用、韦渠牟等得到朝廷征召或恩遇呢？所以，“此中有嘉处”，只能是对极少数道士而言。

（二）先儒后道和外道内儒

唐代士大夫入道者，多数人年轻时都曾经历十载寒窗，学诗作赋，涉足儒家经典，热中科名，希望有朝一日能“春风得意”，“一鸣惊人”。《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至八百六十二列举的三十六位道士诗人，就有九人参加过进士考试，其中有的人还是“累试不第”，直至无可奈何时才去当了道士。这九人是（依《全唐诗》为序）：

吴筠 字贞节，华州华阴人。少通经，善属文。举进士不第，去，入嵩山为道士。明皇闻其名，遣使征至，待诏翰林。天宝中，坚持还山，寻入会稽，隐剡中。大历（776—779）中年卒。

杜光庭 字圣宾，括苍人。喜读书，工辞章翰墨。应百篇举，不中，入天台山为道士。僖宗召见，赐以紫服，充麟德殿文章应制。后隐青城山白云溪，自称东瀛子。蜀主王建赐号广成先生。

郑遨 字云叟，滑州白马人。昭宗（889—904）时，举进士，不第，入少室山为道士。徙居华阴，种田自给。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友善，世目为三高士。唐明宗（926—933）以左拾遗、晋高祖（936—

941)以谏议大夫召，皆不起。赐号逍遥先生。天福(936—941)中卒。

吕岩 字洞宾，一名岩客，礼部侍郎渭之孙，河中府永乐(一云蒲坂)县人。咸通(860—874)中举进士，不第，游长安酒肆，遇钟离权(?)得道。不知所往。

张辞 咸通(860—874)初，进士不第。游淮海间，有道术。尝养气绝粒，好酒耽棋。后于江南“上升”。

许碏 高阳人。累举不第，学道于王屋。周游名山洞府，到处于石崖峭壁人不及处题云：“许碏自峨嵋山寻偃月子到此。”笔迹神异。竟莫详偃月子也。游庐江，醉吟一诗，人皆笑为疯狂。后插花作舞，上酒楼醉歌，“升仙”去。

张白 衡州人。少应举不第，入道。常挑一铁葫芦，得钱便饮酒，自称白云子。

段毅 累举进士不第，忽如狂，市中讴吟其诗。后死，及葬发现，但空棺耳(按无稽之谈，当为隐遁入道去)。

陈抟 字图南，后唐(923—936)末举进士不第，遂隐于武当山。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许多皈依道教、成为道士的士人，并非他们之初衷如此。这在许多道士诗中有明显的反映。尽管这些人的品行有高有下，但开始时醉心功名，未能忘情世事则是共同的。即使他们当了多年道士，有的人甚至成为高道，他们心中却仍然律动着一颗儒者的心。我们不妨称这种心态叫“外道内儒”。至于士大夫中，许多人则抱着“先儒后道”，即先建功立业，待功业圆满后才身退归隐。陈子昂《答洛阳主人》云：

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

事亲恨未立，从宦此中州。

卢士衡在《游灵溪观》诗中也说：

不为壮心降未得，便堪从此玩清虚。

所谓“壮心”，也就是儒家的“显亲扬名”、“治国平天下”之心。在玄、

肃、代、德四朝时官时隐的李泌，在《长歌行》中也唱道：

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事实上这种“先儒后道”的情况，只是作为一种儒者心态而存在，真正实行的是极少数，如贺知章功成身退，归隐四明，王建诗中的唐大夫“年少平戎老学仙”（《送唐大夫罢节归山》），施肩吾中进士后到洪州西山当道士等。但是，这种自愿离开官场、超尘脱俗的毕竟不多，而且都是在迟暮之年、头颅老大以后^①。

在道士诗人中，吴筠的诗名最著。《新唐书》本传赞誉他的诗可与李白“相甲乙”。而《旧唐书本传》则称：

（筠）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惟筠乎！

话虽说得过头，但也可见吴筠诗在当时影响之大。《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三录存吴筠诗一百一十八首，又外编补遗十首。其中可称纯为道诗的有《游仙诗》二十四首、《步虚词》十首和《咏龙虎山道士飞升》一首。其全同于世俗诗人之吟咏题材的则有咏史怀古诗一十五首、登临感怀诗二十七首和边塞诗一首。至于《高士咏》五十首则融合俗情与道味，两者兼而有之。下面我们先集中探究一下这位道士诗人的咏史怀古篇，看看他的儒者心态。

外道内儒，对世事的未能忘情，是吴筠诗中所反映的基本倾向和主导心态。

吴筠少通儒经，善属文，具有积极用世的思想，由于举进士不第而入道。《新唐书》本传说他“不耐沉浮于时”才去入道，是大可玩味的。其时吴筠并未跻身宦途，“沉浮”自不指官场的升迁沉降。大约由于多次应试，亲自体验和目睹了科举场中的遭遇荣辱，无法忍

① 唐明皇《送贺知章归四明》序云：“朕以其年在迟暮，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游。”《金华府志》载：“肩吾以长庆（821—824）中隐洪州西山学仙。尝贻徐凝书云：‘仆虽忝成名，自知命薄，遂栖心玄门，养性林壑。赖仙圣扶持，虽年迫迟暮，幸负龙钟。’题其后曰：‘西山学仙者施肩吾顿首。’”

受，因而不耐竞逐，就弃儒入道了。对于早岁的这一段历史，他时常忆及。《酬刘侍御过草堂》云：

弱冠涉儒墨，壮怀归道真。

又说：

既怀康济心，仍许隐沦归！

正是年轻时积极用世思想受到挫折才转而归道的真实剖白。《尚室·蔡仲之命》：“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传曰：“为政当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业。”所谓“康济心”，正表明吴筠年轻时是很有远大志向和抱负的，即使当他栖居“远林”、“绝巘”，而每当忆及早岁襟怀，仍有很深的感慨。这种感慨更集中地表现于他的咏史、览古诗。根据所表达的思想，大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剥开面貌的面纱，歌颂儒家匡济天下的思想。《览古十四首》之一云：

圣人重周济，明道欲救时。

孔席不暇暖，墨突何尝缁。

兴言振颓纲，将以有所维。

热情歌颂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即所谓“重周济”、“欲救时”。班固《答宾戏》云：“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第二联形象地描绘了孔子为匡济天下席不暇暖、到处奔走和墨子的废寝忘食、连烟囱都不曾烧黑的精神。为什么这样？圣人要“振颓纲”，要“有所维”。这种对儒墨圣人的热烈歌颂，哪里像是一位道徒的思想呢？所以我们完全有根据说他是一个“外道内儒”的士大夫，他的世界观明显是儒道相佐和儒道互补的。在这首诗的后半，诗人又谴责了秦皇的焚书坑儒，赞颂汉武的推崇儒术，认为自汉代以后，儒家的经籍才又兴盛起来。《览古》之四就是歌颂儒家的《书》和《礼》的：

箕子作周辅，孙通为汉臣。

洪范及礼仪，后王用经纶。

要验证吴筠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可以参照他待诏翰林时回答玄宗关于道法和神仙修炼的询问。《旧唐书》本传载：

玄宗闻其名，遣使征至。既至，与语甚悦，会待诏翰林。帝问以道法，对曰：“道法之精，无如《五千言》，其诸枝词蔓说，徒费纸札耳。”又问神仙修炼之事，对曰：“此野人之事，当以岁月功行求之，非人主之所宜适意。”每与缙黄列坐，朝臣启奏，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玄宗深重之。

十分明显，吴筠对道教典籍，只重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认为其余的道书都是“枝词蔓说”，同一般道士之浸淫炼丹术、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死，很不相同。而且，对玄宗问神仙修炼事，他的回答竟完全是一个儒者的口气，其所陈奏，也只是“名教世务”。可见吴筠绝不是纯粹的道徒，而是外以道名而内实儒术的士大夫。

其次，吴筠在咏史怀古诗中，对最高统治者的揭露、讽谏，也表现了他的儒家“匡济天下”的精神，《览古》之三云：

株宇代巢穴，其来自三皇。
迹生固为累，经始增百王。
瑶台既灭夏，琼宝复殒汤。
覆车世不悟，秦氏兴阿房。
继踵迷反正，汉家崇建章。
力役弊万人，瓌奇殚八方。
徇志仍未极，促龄已云亡。
侈靡竟何在？荆榛生庙堂。

这是揭露和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侈靡居室而大兴土木，力役万人。其他的览古、怀古诗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出儒家对最高统治者的规范要求。《览古》之四云：

闲居览前载，恻彼商与秦。
所残必忠良，所室必凶嚚。